

行行重行行

(续集)



费孝通
著

群言出版社

行行重行行

(续集)

樊孝通

著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行重行行:续集/费孝通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7.4

ISBN 7-80080-191-8

I. 行…

Ⅰ. 费…

Ⅱ. 费孝通-文集

N.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893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14 千字 2 插页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G·95 定价 12.90 元

续集前言

《行行重行行》是我1980年开始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中学术成果的一部分。这本集子是1992年8月出版的,1993年8月再版,共收入我写的有关我国乡镇发展的论述三十八篇。我一向主张理论结合实际治学方法。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时,我正好恢复了能下乡实地调查的条件。从1981年“三访江村”起我就投入乡村和城镇调查,到目前已十有六年,除了西藏和台湾外,我遍访了全国各省(区)。上述这本集子收集了我1982年到1992年这十年中有关乡镇发展的论著。1992年到1996年的四年我的穿梭访问并没有停止。这段时间里一共又积了有三十篇论述。今年正是我开始江村调查的六十周年,也可以说是我正踏进第二次学术生命后期之前,很想把这方面的存稿清理一下,编成一本《行行重行行续集》行世。

岁月不饶人。我自从度过八十五岁后,自觉很多事已力不从心。比如按照我过去的习惯,每访问一个地方,总是把在当地各种场合讲的话,尽可能地存放在录音机里,请人代为整理后,凭稿动笔改写成准备发表的文章。这几年来,我就没有这么多精力篇篇都从口述改写成文稿了。所以在《续集》里有若干篇我只能直接用口述稿,略加润笔,编入集中了。这是续集在体例上和前集略有不同之处。

从内容上说,《续集》的重点是中部地区。事实上,我这四年观察的范围并不限于这些地区,西北和东北我都去过多次外,我几乎每年都回家乡所在的东部沿海地区追踪调查,但写下的记录却大多没有整理成章,无从都编进这集子里去。

我这几年着重在了解中部地区可以说是有意识的选择,因为我多年来已一再强调从全国来说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差距。这种地区性的差距固然是客观条件决定的,但我总觉得应当在国家的政策上及时尽力设法予以缩小,至少不应当任其扩大。这使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上比较落后于东部的中部地区了。

当我主观上重视了中部地区时,我就发现自己过去对中部地区陆续出现的那些自发的跨县市的经济协作组织总是视而不见,没有及时看到其重要性。我这几年才被冀鲁豫皖以及闽浙赣等省边区早已存在着的若干经济合作区所吸引,多次去参加它们的活动,取得不少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构成了这本《续集》的主要部分。这些认识又引导我提出发展中部看来需要在引进现代工业之前要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的见解,就是先通过我在前集中已提到过的庭院经济,使农村里千家万户提高收入,积聚资金,发展乡镇企业。这正是我在“续集”里所记下的,在河南信阳我初次听到的“公司+农户”,又在焦作看到从这个农民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公式里发展成了“公司+基地+农户”。不久前又看到郑州的报导,在这个公式里又加入了“市民”一个环节,就是城市居民集资,通过公司组织,联系农户代为饲养各种高值的禽畜,形成新的没有围墙的城乡联合企业,充分发挥久已以农仓闻名的中部地区所具的特色,加上科技服务,正可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事实大大地启发了我的思路,认为我们必须从地区的

突出优势出发来探索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新的路子。这条原则看来不仅适用于中部,也可能同样适用于西部。

这本《续集》记录了我最近四年对中国城乡及地区经济发展这条思路的新发展。我在进入九十年代初期已经提出了经济区域的观点,但是对这观点的内涵还是不够清楚。回想起来,早在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广西的梧州和南岭山脉里旅行时,看到了香港经济中心的外围地带的发展前途,开始加深了我对经济区域重要性的认识,忽忽已过了有十多年了,直到经过浦东的视察,看到了这中心对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以及长江经济带的脊梁作用。在这四年里对经济区域发展的概念,正推动我从这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把我引进了东北地区,放眼看到了21世纪可能出现东北亚开发热潮。又由于今年京九路沿线的参观视察,加深了我对发展亚欧大陆桥这条经济走廊现实的重要性。最近我又提出了京津冀联手建立华北经济区的设想。这一条思路实际上贯穿了这本续集,同时也粗线条地画出了这一时期我思想的轨迹。

最后,我在这四年里也出国了几次参加东亚和南亚的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一些议论,顺便整理出来,作为这本续集的附录。在告别1996年时,我愿意用编成这本《续集》来表示我感谢许多亲友祝贺我健康、长寿的好意,并希望老天能多给我几年的生命,使我能多看到一些我们中国和中国人发愤图强的美好景象。

1996年12月31日 于北京北太平庄

目 录

续集前言

1	近年来中国农村发展的几个阶段
13	论中国小城镇发展
22	展视中国的乡镇企业
29	邯郸行
38	广宗扶贫
45	淄博行
53	威海讲话
58	泰安讲话
68	肥城讲话
73	菏泽讲话
76	滨州讲话
81	焦作行
92	信阳行
104	濮阳讲话
112	豫中行
129	蚌埠讲话
137	重访徐州
148	再访温州

168	清溪讲话
170	三访赤峰
188	铁岭讲话
197	黑龙江行
208	哈尔滨讲话
214	毕节行
222	再访震泽
228	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
235	浦东讲话
240	再话浦东
250	天津献策
257	再话天津

附 录

262	新德里讲话
268	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奖的讲话
273	马尼拉讲话
282	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
290	从小书斋到世界新型图书馆

近年来中国农村 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

我想借这个来港讲学的机会，介绍一些我国大陆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所说近年来是指七十年代末起到目前为止，一共大约包括近 15 个年头。这正是中国农村历史上发展得最快的年头，值得我们回顾一下。这一段时期为了方便可以分几个阶段来讲，先讲一段发展的背景，再讲大发展的初期，其后的 5 年是各地根据不同条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形成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进入九十年代后的最近这几年是城乡结合吸引外资，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时期，同时因为各地发展速度不同，出现地区间差距，提出继续前进中的一系列问题。

进入这三个发展阶段之前，我想应当讲一下这三级跳的背景，也就是要说明从什么、在什么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的。三十年代中期，还是在抗日战争发生之前，我在江苏省太湖附近的一个农村里进行一次社会调查。这个地方过去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就是说在全国曾是最富裕的地方。我根据这次调查所写成的《江村经济》一书的结论里说，中国的问题是一个

饥饿的问题。农民吃不饱肚子。我算了一笔帐,因为这地方人多地少,农民一家在自有的小块土地上辛辛苦苦耕种了一年,收获的粮食刚刚够全家人吃饱肚子,生活上其他费用就得另外想办法来张罗。这种人家还算是好的,在全村不到三分之一。大多数农民都已把土地卖给了地主,农田上的收获有一半之上要作为地租交给地主。那就是单靠农业连肚子都吃不饱了。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方还是这种情况,其他地方的农民就更穷困了。这是导致解放战争的根本原因。农民要生活,土地制度必须改革。

到了四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有了土地,情况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基本情况并没有改变。农民的贫穷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到六十年代初还发生过困难时期,我调查过的江村确实有不少人逃荒和饿死。这个农民的贫穷问题根本上是出于人多地少,农村经济如果只靠种粮食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在1966—1978年“文革”时期由于推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农村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际。直到七十年代末“文革”才结束,到八十年代初各地陆续停止了公社制度。这才开始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近年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功是在农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就是土地的经营包给农户,农民只要交纳定额的粮食卖给国家,可以自己支配他们所承包的土地和自己的劳动力。这样把农民的劳动生产力解放了出来,通过各种各样渠道,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这是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因。中国农民就在想方设法利用他们从事农业以外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来创造财富的道路上开创了农村经济大发展的局面。

农民只能靠种田吃饭，不能靠种田生活。这是广大农民从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也说明了人多地少的农村里的一条普遍的规律。人除了吃饱肚子外还有衣着、居住、社会来往等等生活需要。种田是指种粮食作物，单靠种粮食，农民至多只能吃饱肚子，其他生活需要就没法满足了。因之，“以粮为纲”的政策是做不通的。农民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在种粮食之外搞些收入才能维持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所以即在公社时代农民还是偷偷地搞各种副业活动。农村里几天一次的小市集，那种最基础的商品流通场合，一禁再禁还是禁不了。这里赶散了，换个地方又集合了起来。这说明要农民走单一经济的路子是不现实的。尽管在公社时代，农民还是在搞多种经营的副业活动。

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在长江三角洲的各市县的公社本身已感觉到“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政策在农民生活需要的压力下已无法执行，于是就利用城市里的工厂因为“停工闹革命”让出了市场，又把许多有技术的工人赶回乡村老家，公社和生产队纷纷用“以工补农”的名义，开办小型工厂，容纳社队里剩余劳力，进行工业生产。开始时还是借了官方允许存在的“农机修配厂”的招牌作掩护，后来就蔓延成了大片的“社队企业”，就是公社和生产队办的企业。这是农业里发展工业的初期形态。由于这些企业是属于公社和生产队所有，由公社和生产队经营管理，所以它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大家认为还是公有制，是姓社，不是姓资。因之在一些地方还容许它们存在和发展。

回头来看“社队企业”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确是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首先是公社和生产队是个集体的经济实体，可以自由支配它拥有的集体财力，有力量投资办工厂。比如我上述的江村为了要恢复缫丝工厂，就协同了附近的几个生产队，凑足了几万元去购买设备。而且公社和生产队本身是个行政管理机构，兼管新办的企业也比较便利。最初这种企业是和农业一样管理的，比如劳动力即由主管的公社或生产队分配到户，企业的收入和农业的收入合并在一起年终结算分配给社员。工人出勤上工等于到地里去做农活，按出勤记工分，再按工农总收入计算工分值，年终结算给各户。这种工农混合的集体经营方式在公社解体时才开始改革。但是它却完成了从农业里长出工业来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接生的任务。

公社制的解体在时间上各地不完全一致。在江苏是1982年才完成。公社制所遗留下来的那些社队企业是无法实行包产到户的。土地可以分划成小片承包给农户，工厂却不能拆散给各户。所以社队企业没有动只改了个名称为乡村企业。原属公社的由乡政府所有。原属生产队的归村政府所有。在公社时期，这些企业实际上是由社队干部管理的，公社制取消后就归乡村干部管理，实质上没有多大变化。地方政府所有的乡村企业和国营企业是有区别的，因为社队企业本身不属于计划经济，而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中的法人，只是这种法人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派人经营管理。它的性质不易说清楚，或者可以说是属于基层地方政府办的市场经济性质的企业。具体地说是在计划经济之外发生的一种市场经济性质的乡村政府办的中小企业。这种企业后来一般称为乡镇企业。

公社群体作为乡镇企业脱胎的母体,其后的5年中正是它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农民大力地把工业引进乡村,但是各地乡村引入工业的方式因客观条件不同而各具特点。从全国范围来说,各地农村吸收工业不仅时间上有先后,规模上有大小,而且所形成的形式都有所不同。我们从各地的调查中分出了若干不同模式。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和主要的,就是这些在乡村里发展的工业,不是由国家规划的,而是由农民自己创造的,而且都是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如果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步,乡村里办自筹原料、自己生产、自行推销的小型工厂,事实上走出了一条市场经济路子,应当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步。这一步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为改革开放闯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

让我接着简单地介绍一下乡镇企业的几种主要的模式。

上面我已讲到在我的家乡苏南的农村里在“文革”时期已经开始偷偷的办起了小型工厂,称作社队企业。公社制度取消时这些集体企业并没有拆散,而由接替公社和生产队的乡和村接收过来,由这些基层行政机构继续经营管理。改称为乡村企业,后来又统称为乡镇企业。这种企业的产权属于基层行政机构,自负盈亏,所得盈利除了工人的工资外由地方支配,主要用在扩建工业和地方公益事业及补贴农业建设和农民收入。所以成了地方政府财政的一项重要来源。走这种路子的我们称它作苏南模式,因为最早我们是在江苏南部观察到的。凡是在公社制度没有解

体前利用集体积累办起来的企业都属于这个模式，不仅限于苏南，其实沿海各省太多在不同程度上是采用这种模式起步的。

我们在温州看到另一种以家庭企业为主要的乡镇企业。温州农村过去也和苏南一样是人多地少，但是附近没有像上海一样的工业城市，所以大量人口只能出海谋生，解放后出海的道路被封锁，农村里多余人口大量流向全国各地，卖工卖艺，做那些靠个人技术的木工、成衣、理发等等工作。一时在全国各地到处有这一类浙江来的服务性流动工匠。在1984年政府开放长途贩运后，这些已在各地流动的浙江人，形成了一股在各地搞商品流通的队伍。他们用贩运挣来的钱，积累起来开始在家乡利用家庭里的劳动力，制造容易推销的小商品，如钮扣、家用炊具、小型的电器等等。在八十年代前期，温州市几乎家家户户在制造小商品，并且形成了十几个专业市场，吸引了全国的客户。这种制造小商品的家庭工厂和供销全国的专业市场形成了一种发展农村经济的特有模式，我们称之为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各户各家自办的家庭规模的小工厂，集合起来在一个专业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小商品，我称之为“小商品、大市场”。它不同于苏南模式之处是实行个体所有制而不是苏南模式的集体所有制，和苏南模式相同之处是开拓市场经济，和国家的计划经济脱了钩。家庭企业其实并非真正的私有制，因为乡村里家庭成员可以包括有亲属关系的许多人。所以可以说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股份制。到九十年代小商品制造业的发展和扩大，许多原有的家庭企业联合了起来，成了真正股份制的企业。提供了乡镇企业的一个新的模式。

八十年代初期在深圳成立了经济特区，最先实行对外开放

的政策，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上的各个县市的农村，首先接受港商采用三来一补的企业形式引进了现代工业。这种企业是香港工业的延伸和扩散。因为大陆农村的劳动力便宜，香港的小型工厂就把需要劳动力的制造部分的车间搬到大陆的农村里，留着经营的门市部在香港，所以称作“前店后厂”的方式。这种三来一补的方式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总之是把一个企业跨界分工，一方面得到面向国际市场的便利，另一方面得到内地劳力工资较低的便宜，把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联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从珠江三角洲的农村这一头来说，这是引进现代工业的捷径。这个地区的农村工业化比全国各地都发展得快，起步虽较后于苏南地区，但是依靠香港工业的扩散，发展势头很快赶在前列。当地人说三来一补是“借船出海”。接着他们就“造船出海”就是吸收外资独立经营，店面和厂房都在大陆。八十年代末期，珠江三角洲吸收外资引进高新技术办厂的方式已经蔚然成风。

几乎同时，福建的侨乡已有为数众多的侨胞和国外华人回家乡投资办企业，引进新技术、新产品，而且深入乡镇，大大发展了侨乡农村经济。这和珠江三角洲的当地居民和香港侨胞合资办企业是同一性质。这种形式的中外合资企业逐步向北发展，浙江、江苏和山东都先后走上了这条路。最初大多以原有乡镇企业为基础分别吸收外资成为中外联合经营的企业，其后形式也多样化了，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1991年1—2月）的号召，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各地方大中城市纷纷建立开发区，用来吸收外资和迅速发展工业、贸易和第三产业。使中国农村经济进入了又一个新阶段。

四

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前，以农村为基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凡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当地的农民生活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以我所熟悉的苏南来说，在进入八十年代时，农民的平均年收入还徘徊在 200 元人民币上下。到进入九十年代时，农民的平均年收入都超过了 1000 元人民币。凡是乡镇企业不发展的地区，农民的生活虽则有所改善，但很少平均收入能超过 600 元人民币的。中西部地区则更要低。

这是说由于农村工业化速度上有快有慢，全国各地农村的经济水平也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在这里让我补充讲一讲在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农村情况。先说中部，以两湖地区来说，历史上是中国的主要粮仓，有“两湖熟，天下足”的老话，两湖就是指湖南和湖北，长江中部的平原。在这大片平原上，除了武汉之外，没有重要的工业中心。广大的农村里就是以粮棉油为主要的农产物。八十年代我去调查时，洞庭湖周围还很少有乡镇企业。农村主要是靠农业和副业为主。自从公社制度解体后。农村里大多在种植粮棉油之外还是在土地上做文章，从事多种经营发展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1986 年我去洞庭湖区调查时，正值苧麻涨价，我所到的农村几乎都在种这种经济作物，但是没有看到利用这种原料来发展纺织工业的。在山区的农民则以种果树来挣钱，性质和种麻一样，还限于经济作物的范围里。他们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副业经营，所以我们称之为“庭院经济”。这种性质的经济

固然增加了一些农民的收入,但是发展的限度很大,所以即使在经济作物价格高的时候农民平均收入也比不上发展了乡镇企业的地区。而且由于流动渠道狭小,经济作物价格稳定不住,多产了反而会受损失,农村经济不能稳步上升。

至于西部边区各省区和沿海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差距就更大了。西部边区有资源,而且也不是没有工业。在抗战时期就有一批工业搬迁到内地,开国后又在苏联的支持下兴建了不少重点工业;在和苏联对抗时,又在西部发展了一批称作“三线工业”,总的投资有几千亿人民币。但是这些企业不仅都属国营的计划经济,而且大多是军用企业,和当地农村不相联系。企业里工人和技术人员几乎都是从外地移入的。它们从当地采取资源,制成产品后,按计划运往外地,所以形成了不少分散在西部的封闭性工业孤岛,其中有些本身已发展成为拥有几万人口的新兴城市,但并不能带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在1984年去调查时,离兰州市不到一个多小时汽车的定西,当时是个有名的国家重点扶贫县,西部地区的农村当时还属于贫困地区。这种基本情况直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才发生了初步变化,主要还是由于开放工业孤岛,把现代工业逐步扩散到四周的农村里,发展了乡镇企业和市场经济,同时国家在西部进行能源、交通和水利的建设,使得农村里的乡镇企业有了兴起的条件。国家还大力推行扶贫政策,把荒山旱地的一部分居民迁移到土地比较肥沃的河西走廊,建立了新农村。西北农村的面貌这几年已开始有了改变,但是如果和沿海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以上我想讲的是中国农村生产力近年来虽然一般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发展的水平是很不平衡的。大体上出现梯形倾